

明清乌撒地域的卫所移民与民族交融

王丹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 明代以来, 大量中原汉民和西北回民、蒙古人穆斯林移民屯守于乌撒地域。同时, 汉民通过祖先叙事、文化符号、神明信仰等方式彰显自身的族群身份, 而回民及蒙古人穆斯林也借助族谱、碑刻等文本和伊斯兰信仰维护自身族群边界。但是, 各民族之间也通过婚姻互动、利用共同文化符号来走向“一体”。明清乌撒地域的卫所移民和民族交融既反映出中国各民族实体长期以来对自身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两个认同层次, 又体现了中国各单一民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明清; 乌撒地域; 卫所移民; 民族; 交融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07 (2024) 04-0017-08

目前, 海内外对黔西北区域史、民族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彝族土司、基督教与苗族认同、回族身份的维系。^① 这些研究基本梳理清楚了黔西北彝族、苗族、回族同胞的身份认同、社会机制、文化意识等内容, 但多局限于单个民族的讨论, 并未注意到长时段以来当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历史动态。此外, 卫所移民的“在地化”及其与地方各民族的社会互动内容也没有得到重视。因此, 笔者尝试初步讨论卫所移民与其他民族的交融问题。

一、乌撒军民府与乌撒卫

乌撒地域主要为今天贵州省威宁县和赫章县全境。截至2023年, 威宁县总面积6,298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2,200米, 总人口159.8万人, 有汉、彝、回、苗等37个民族,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4.02%。^[1] 赫章县总面积3,242平方公里, 总人口89.23万人, 平均海拔1,996米, 有汉、彝、苗、白等31个民族,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0.91%。^[2] 两县地形以山地为主, 丘陵、谷坝次之。

“乌撒”为彝语的汉译, 又译为“俄索”“五所”, 是传说中迁徙至黔西北的早期彝人头领之名, 后其子孙以武力建立部族政权, 便以乌撒为名。《元史》载“乌撒者, 蛮名也……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 尽得其地, 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3]¹⁴⁸³ 乌撒部在元初归顺中央王朝, 其时, 就有官方组织的军事移民来到当地。这些移民主要分

为两类: 一类是来自云南的爨人、僰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乌撒路军屯, 以爨僰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3]²⁵⁷⁷ 但至元末时爨僰军户已基本转化成普通民众, 史籍中再无相关记载。另一类是来自西北的军户。明代史料载云南临安卫武将“刘顺, 旧名添王奴, 三原县军籍, 系刘孛儿直嫡长孙。祖前乌撒宣慰司同知, 洪武十六年赴京, 钦除临安卫世袭卫镇抚。”^[4] 三原县位于陕西, 刘顺的祖父刘孛儿直曾任乌撒宣慰司(应是“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 笔者注)同知, 洪武十六年(1383年)调临安卫任职。刘孛儿直显然是流官同知, 名义上协助宣慰使掌司事, 但其首要职责更可能是监视为世袭土司的彝人宣慰使。此史料虽然能够印证元代时西北军户因政令而流动至乌撒地域, 但难以确认刘孛儿直是否统率大量西北军户驻守乌撒。值得注意的是, 有研究认为元代时已有少量来自西北的畏兀儿人群征战西南彝区后辗转留守于乌撒等地域。^[5] 不过, 元代虽然有军事移民来到乌撒地域, 但移民总量及其社会影响都相对较小, 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及对乌撒地域社会、自然环境的深刻塑造还是始自明代。

元末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宣慰使鲁迂诺直死后, 其妻实卜摄政, 元政府为其加云南行省右丞之职。^② 洪武初年, 朱元璋派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等人率兵征讨西南地区的元廷残余势力。洪武十四年(1381年)

收稿日期: 2024-02-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大历史观’视野下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路径与方法”(23XMZ069)。

作者简介: 王丹(1997—), 男, 彝族, 贵州威宁人, 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西南民族史、历史人类学。

十二月，傅友德攻破曲靖后又取乌撒城^{[6]2215-2216}。明太祖朱元璋颇为看重乌撒地理位置，史料记载他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向傅友德等人提议：

敕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曰：自云南捷报至，朕念将军久劳在外，但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土酋，当悉送入朝。盖虑大军既回，诸蛮仍复啸聚，符到之日，不限岁月，一一送来。霭翠夫妇，亦如之。前已设贵州都指挥使司，然地势偏东。今思控制之法，莫若于实卜所居之地立司，以控贵州普定、普安、霭益、东川、芒部、乌蒙、永宁、建昌等处。卿等以为何如？宜审图可否为之。^{[6]2234}

首先，朱元璋希望傅友德等人能将乌蒙、乌撒等彝人土官送入南京朝圣。其次，朱元璋认为新设立的贵州都指挥使司地势偏东，对于普定、普安、霭益、东川、芒部、乌蒙、永宁、建昌等彝区鞭长莫及。因此，他向傅友德等人提议可以考虑在实卜所居之地，即于乌撒中心区域设立类似贵州都指挥使司的省级军事机构，以统摄各部彝区。朱元璋的提议，是基于明王朝如何稳定治理复杂的西南彝区的重要考量。不过，明廷最终只在乌撒地域设立乌撒军民府和乌撒卫。

洪武十五年（1382年），乌撒归顺明王朝，明廷在当地设立乌撒府，任命实卜为首任知府。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乌撒府为乌撒军民府。同年五月，赐实卜朝服一通并常服一袭，实卜于十月朝贡，又诏赐其织锦、文绮、钞锭等物。^{[6]2234}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设立乌撒土府和实施土司世袭制度，既能在较大程度上保障世居彝人群体的利益，又能较好稳定地方局势。乌撒军民府有如下特征：一是土司承袭的准允权由朝廷严格控制着。明代文献《土官底簿》详细记载实卜死后乌撒土知府的承袭延续情况，继承者们需要进京面圣，方能奉旨袭职。^[7]二是乌撒土府似乎并未长期编设里甲、不征收制度性的赋税。洪武十六年（1383年），乌撒军民府自云南布政使司改隶四川布政使司。明代早期史料，如景泰《寰宇通志》、嘉靖《四川总志》等均未记载乌撒军民府的里甲编民情况。万历《四川总志》记载乌撒土府编户二里，温春来认为实际编户最多几十户，仅具有象征意义。^[8]此外，乌撒军民府只需上贡或协济马匹、粮钱，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川乌撒军民府土酋叶原长，献马三百匹、米四百石于征南将军、西平侯沐英，靖宁侯叶升，以资军用。”^{[6]2904}三是乌撒军民府控制乌撒地域的绝大部分土地。史料载，乌撒府“东西广四

百四十里，南北袤三百五里。”^[9]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廷还在乌撒地域设立乌撒卫，与乌撒土府同城而治。乌撒卫先是隶属云南都指挥使司，永乐年间改隶属贵州都指挥使司。^{[10]310}史料记载乌撒卫疆域与贵州毕节卫、普定卫，四川乌蒙府、镇雄府、叙州府，云南曲靖府相接壤。^{[10]310}但明代官修史料中并未提及乌撒卫与乌撒军民府的疆域分界，而今威宁县盐仓镇存有二通嘉靖年间所立之碑，清楚区分出乌撒卫和乌撒土府的界限，兹录其中一通文字如下：

巡捕指挥使陈于前。本卫管下十里铺止，铺司冯恩忠、保长唐仲仁兄地界。左至地名石口子止，属乌撒府下夷民头目白菲伍约地方倒象坡止。又起至乌撒卫管下左所、腰站，屯军印，千户李承恩，百禄军屯，小片李口，屯头申白脸，保长杨伟，保长马俸。右至地名火烧铺止，乌撒府和下夷民头目伍街沙都地口口白桓止。又起至本卫管下泉铺止，铺口到晋保长朱朝武、王六光地界。嘉靖四十四年立。^{[11]284}

设立乌撒卫是明政府打通内地与云南联系通道的关键，学界称之为“乌撒道”。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乌撒卫有十八个铺舍，其中便有上文疆界碑中的十里铺。^{[10]310}乌撒卫的铺舍和驿站沿着“乌撒道”而设立，屯有军民，旨在保障道路的通行。“乌撒道”的开辟推动了沿线彝民对王朝国家的认同。明正统三年（1438年），乌撒知府禄旧（陇旧）用彝文在驿道旁的山崖上（今赫章县野马川镇朱家坡古驿道）摩刻《通贵州至乌撒驿道》一文，生动地展示出彝人土司对国家政治的高度认同。其文曰：

晚辈后牛上了驿道，书本才是腹中的道路，贤良的人犹如树根强枝壮，帮助皇帝治理边疆，彝家向来以贤德为根本，心向着皇城，为皇帝的事着想，铭于肺腑吐于口，循规蹈矩把人为，把叙述才志本的语言，汇编成文章。^{[11]31-32}

但此后彝人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经历了一定的曲折过程。明末时期统治者与西南各族人民矛盾尖锐，加之其他各类复杂因素，最终引发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奢安之变”，乌撒土知府安效良也卷入其中。^[12]清顺治年间，乌撒土司安重圣归顺清政府，保留原职。康熙初期，平西王吴三桂称乌撒、水西等诸土司谋反，派兵攻打各土司，最终将乌撒军民土府改为威宁府，置流官，隶贵州省管辖。^[13]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后任命原水西土司后裔安胜祖为水西宣慰使，兼辖乌撒地，但安胜祖死后无嗣，清廷遂彻底废除在黔西北地域施行已久的

土司制度。^{[14]3445-3446}

革除土司后乌撒地域就在整体上进入国家直接治理体系。然而,国家权力并未就此全面渗透乡村民族地区,乌撒地域仍旧保留着“非制度性”的土目群体,他们成为了官府治理乡村民族地区的重要帮手。史料载,“夷民俱听土目约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15]此时,在乌撒地域废除土司而保留“非制度性”的土目群体符合当时国家深入治理西南民族地区的需求。^[16]

乌撒卫的设立,还推动乌撒地域农耕经济的发展。乌撒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较为恶劣,明代文学才子杨慎曾言“乌撒天,常披毡。三日不下雨,便是真神仙。”^[17]清康熙时期担任威宁知府的宋起称当地“以牧羊为产,土地瘠薄,经岁资莽麦为食,近城百里不产稻谷,地气多寒,四时如秋冬。”^{[14]3156}世居于此的彝人群体以荞麦种植和畜牧牛、羊、马为主,苗人则多迁徙狩猎。明代大量汉人和穆斯林人群屯田于乌撒卫,洪武时有5,300余人,^{[6]2893}至万历年间增长至8,555丁口。^{[18]303}明中前期,卫所移民初步进入乌撒山区垦殖开发,但遇到灾害时仍难以自给。景泰六年(1455年),巡按贵州监察御史伍星会奏称:

贵州乌撒卫,地在万山之中,刀耕火种以给食。连年水旱相仍,田禾不收。今年二月至六月,淫雨不时,二麦苗稼淹损。七月殒霜,荞菽稻禾俱不成实。夷民饥窘,无以自存。俱发掘蕨根、土瓜,采取栎、橡树葇为食。已令有司于有粮仓分赈济。^[19]

伍氏的奏疏指出,乌撒卫在万山之中,人们靠刀耕火种获得粮食。但经常水灾或旱灾续接,导致粮食歉收。遇到灾荒,各民族同胞只能挖掘蕨根、土瓜和采集树葇充饥,依靠官府开仓赈灾。奏疏说明乌撒卫在万山之间。不过,基于具体地理环境差异,乌撒卫移民又分类屯扎在高山、半山腰、矮处(坝子)。民国《威宁县志》“屯垦志”载“按四十八屯之地,高山屯少于半山屯,半山屯又多于矮处屯。”^{[20]231}盖因高山土地薄瘠,出产甚少,而矮处面积较少,故多数移民被安排到半山腰平田处耕守。民国《威宁县志》又载:

屯田既兴,垦辟无间于所谓高田、平田、底田者,咸为熟土。兵戍土著,世继其业。既无冗故之虞,又得粮秣之资。乌撒遂成为富庶之区,卫民更迭为知方之士。^{[20]227}

也就是说,到了民国时期,汉、回等卫所移民的长期垦殖大幅度地提升了乌撒地域各类型土地的肥力。受益于此,乌撒地域成为富庶之区,民众也

变得知礼法,颇有古人“仓廩实而知礼节”的治民政治设想之风。

乌撒土府改流不久,乌撒卫也裁并到威宁府内。至此,乌撒地域不再有独立于民政系统的管理单元,地方社会治理更为统一、便捷、有效。不过,卫所移民后裔至今依旧保留着祖先屯田的历史记忆。如明洪武年间来到乌撒地域的大部分穆斯林(包括回民和蒙古人)民众屯守于海子屯、马家屯、尚家屯、杨旺屯等地。这些屯田区包括山陵和坝子,穆斯林屯民曾在此进行大规模的垦殖开发。当地回民称:

尚家屯在明朝初年叫回回营。当时,威宁星光开发区到下坝至大洼塘一带多水泽,下坝背后的山上是原始森林,多荆棘,傅友德建乌撒卫城后,命回回营驻扎在尚家屯,挖开下坝至尚家屯之间的连接部,开沟放水,焚林开荒屯田。^③

汉、回卫所移民和世居彝、苗等民族共同开发乌撒地域的历史,也是当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乌撒地域的多元民族既保留相对的族群边界,又通过婚姻交换、文化认同等途径强化身属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部分的格局。

二、卫所移民的进入及其历史记忆的表达

(一) 汉族卫所移民

历史记忆是反映族群认同的重要工具,当下的社会考量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具有更深厚的影响作用。^[21]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乌撒地域有大量汉族移民通过祖先叙事、文化符号、神明信仰等方式彰显他们相异于世居少数民族和回族移民同胞的族群身份。

以乌撒卫赵氏官员一支为例。万历《贵州通志》和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分别载曰:

赵原吉,直隶寿州人,洪武元年升总旗。男铭,二十五年升指挥僉事,调本卫。三世孙颢,永乐四年升指挥同知。沿应龙袭。^{[18]307}

赵颢,正统间任本卫指挥僉事。才器刚勇,善抚士卒。从征麓川上江,奋战而死,朝廷遣祭以褒其忠。^{[10]313}

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赵原吉为直隶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其子赵铭调任乌撒卫,孙赵颢在永乐初年升乌撒卫指挥同知。不过,弘治《贵州图经治》却记载赵颢在正统年间才担任乌撒卫指挥僉事,不仅官职稍低,而且任职乌撒卫的时间相差三十余年。赵颢战死于麓川并受到朝廷祭祀之事,在乌撒地域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明英宗正统年间,朝廷多次调遣四川、湖广、

贵州等地的卫所军队参与征讨位于滇缅边界的麓川思氏土司。^[22]乌撒卫的众多将领亦率兵参与此次军事行动,如史料载:“蒋宣,乌撒卫副千户也。正统三年,从指挥赵喁(颢)征麓川。”^{[14]991}由此可知,赵颢是明王朝派遣去征讨麓川的大军中乌撒卫官军的领头人。

笔者访谈得知,赵氏后裔认为其先祖为南宋皇室,至元末时有名为继宗者迁居“南京凤阳府寿州县白马街柳树巷三眼井。”赵继宗生子赵成美,赵成美生九子,其中一人为赵德胜。时值朱元璋起兵反元,赵德胜与另外八位兄弟皆投身军旅,跟随朱元璋平定天下,是为“九子九将军”。后来,在朱元璋与陈友谅进行较量的洪都之战中,赵德胜中箭而亡,死后被追封为梁国公。赵德胜所生之子即为赵颢。^①

赵氏后裔关于其祖源地为南京凤阳府寿州县的历史认知基本符合上文所引万历《贵州通志》的记载。凤阳府位于安徽,因其为朱元璋的故乡而建制为“中都”,直隶于南京六部。故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赵原吉为直隶寿州人。然而,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赵颢的父亲是赵铭,祖父赵原吉。笔者查询史料亦得知,元末时朱元璋手下确实有将领赵德胜,战死于洪都之战中,且被明廷封为梁国公,其子赵猷为指挥同知。^[23]而且,赵德胜之弟赵端的曾孙还因功被封为武靖侯,世袭至明亡。^[24]若赵颢及其后裔真为赵德胜后人,不可能不叙述赵端等相关历史人物。另外,赵氏后裔还认为赵颢战死于麓川后被封为镇南侯、南雄侯,但笔者查询史料发现明代并无镇南侯封爵,洪武年间倒是有名为赵庸之人受封为南雄侯。^[25]因此,赵氏后裔虚构和嫁接了赵颢的祖先世系身份。

“白马街”“柳树巷”等地域符号则被本地多数汉族移民认为是他们的祖源地。除赵氏外,多位明清时期来到乌撒地域屯守的移民后代,也在其祖源地认知结构中提到“白马街”“柳树巷”。如,陈氏、廖氏、周氏武将后裔的认知:

(陈氏) 追溯陈氏祖籍:本于山东省济南府大水井柳树巷三板桥陈本街。明朝洪武二年,调北征南,先祖任指挥使赴黔来威,住威宁城顺城街。距今已有633年。^⑤

(廖氏) 吾始祖廖时作,湖南保庆府武刚州文板桥锣锅井白马街柳树巷。康熙年间到威宁。^⑥

(周氏) (一)居江南应天府白马街柳树巷白玉大石版为记(迁六支传说)。(二)居江南应天府金鸡街白马寺(庙)(威宁老周家山神主碑文载)大

槐树人氏。(三)居江南应天府白马湖边周家庄任氏(小海支系传说)。^⑦

陈氏提到了“柳树巷”,廖氏提到“白马街柳树巷”,周氏关于祖源地则有三种说法:其中一种提到“白马街柳树巷”,另外两种的地名结构中也出现了“白马”。因此,可以肯定乌撒地域的“白马街”“柳树巷”等地名符号是汉族移民后裔主导建构的祖源地符号,是他们移民乌撒地域后形成共同认同的工具。不过,这一符号工具逐渐被乌撒地域其他民族所挪用,后文再予以讨论。

乌撒地域汉族移民通过推广神明信仰来强化族群认同感。明清乌撒土司虽受中央王朝羁縻统治,但彝人群体仍旧较大程度地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表现在尊重布摩所掌握的祭祀体系。^[26]同时,彝人以外的其他众多族群也有自身信仰,景泰《寰宇通志》载乌撒军民府之人“病不医药,唯祷鬼神”。^[27]直至民国,时人仍旧记载苗民“习俗特殊,或桑拜禽兽以为神”,反映出乌撒地域的苗族群众在接受基督教信仰前保留着的自然崇拜。^{[20]302}

汉族卫所移民携带“正统”神明信仰进入了乌撒地域。乌撒卫依据朝廷礼制营建众多祭祀“正祀”的仪式场所,乌撒卫中的汉族官员还自行建造佛道寺观。如,嘉靖《贵州通志》载“灵官庙,在卫治北风岭山中。嘉靖二十九年指挥陈谟建”^[17]。灵官庙位于今威宁县城凤山之上,其主体建筑供奉真武帝,故被地方人群称为“上帝庙”,该庙在历史上的信众主要是卫所汉族移民。庙内存有一块万历年间所立的残碑,碑文依稀可见“老爷殿宇,先卫主陈公讳谟”等字,可以判断出乌撒卫陈氏官员在该庙宇的修建中扮演重要角色。^⑧

乌撒地域的汉族移民后裔不仅崇祀正统神明,还“神格化”祖先形象,标注自身奉献国家政治,凸显与周围其他民族群众的身份差异。今威宁县城赵氏宗祠所立之碑载:

吾祖颢公,金陵名将,开疆辟土,佐国平南。麓川喋血,奋绩捐躯。圣上闻之,伤心叹曰:佐国之臣,两世勤王,有口皆碑,即追封颢公为镇南侯,又南雄侯,又封为麓川神也。颢公战死麓川,因以为号。并在乌撒,今威宁为公修建忠烈祠,云:岁时祭祀。又命钦差二员奉旨选葬于乌撒城南半里响塘坡山,今威宁城关响塘坡。钦赐御祭对联云:麓川从戎鸡鸣剑光横北斗,武侯继续马踏云岭锁南天。敕令子继父职,赵氏官爵与国共存。^⑨

由碑刻文本可知,赵氏后裔主要从三个方面塑

造赵颢的忠君形象：一是具象化皇帝对赵颢的口头和文字赞扬，从而密切赵颢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夸大赵颢的政治身份，虚构赵颢被封为镇南侯、南雄侯的爵位；三是将赵颢神格化，为其塑造“麓川神”的神明身份。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其他汉族卫所移民后裔也有祖先征战麓川、战死成神的传说。如，周氏始祖周畿的碑文称：

麓川战争平息，建文帝闻之，追封战死沙场，忠君报国的畿公和赵颢将军为镇南侯。并赐畿公和赵颢将军为麓川大神。^⑩

周氏后裔的历史记忆并不符合史料中赵颢在正统年间征麓川的史实，而是认为是明初的建文年间。不过，赵、周二姓后裔都将“神格化”的祖先崇拜延续下来。周氏后裔告诉笔者供奉“麓川大神”的具体仪式：明代时他们祭祀先祖周畿的牌位，上书“姓如日月辉天地。德似江河浩海洋。洪武武威将军，周氏麓川大神。畿公之神位。子孙永祀。”但清代不允许供奉，否则要杀头，便供奉画像。如今，周氏后裔依旧供奉“麓川大神”神位，视之为家神。他们在神位前放着一碗干净的水、油灯、香炉，于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五和除夕晚上、正月初一至初三上香、烧纸、磕头。^⑪

（二）穆斯林卫所移民

来到乌撒地域的卫所移民包括大量回民、蒙古人穆斯林，其后裔在今日多为回族。如蒙古人穆斯林卯氏，万历《贵州通志》载：

卯失喇。陕西开城县人。洪武十九年，升副千户。五世孙曦，成化四年升指挥僉事，调本卫（乌撒卫，笔者按）。沿有光袞。^{[18]308}

2012年，威宁县草海镇卯家沟出土了卯失喇孙子卯实考的墓碑，碑名为《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千户所正千户卯公之墓》，碑文落款时间为明景泰三年（1452年）。碑文记载卯失喇为“陕西平凉府开城县六盘山蒙古人”，碑文还提到卯实考承袭乌撒卫右所副千户，因麓川之战立功而升为正千户。^⑫而手抄于清光绪年间的《卯氏族谱》则称：

始祖公讳石纳（失喇）……系陕西平凉府回籍……又于洪武十四年，始祖同沐国公钦奉圣旨，专剿讨罪，征南战北，镇守乌撒卫……^⑬

由此可知，卯氏为蒙古穆斯林演变的回民。而于明代来到乌撒地域屯守的穆斯林不止蒙古人卯氏，又如万历《贵州通志》载乌撒卫“下坝”为“回回营”“每年纳养租九成，银六两。”^{[18]305}“下坝”位于今威宁县城，居住者多为马氏回族，称为“下坝马”支系，他们在纂修于清嘉庆年间的族谱

中记到：

因念昔者尝考吾教先世，原居西域国……吾家太始祖于大明时持参职缺大将，补乌撒卫千总，自陕西西安府奉委升迁贵州大定府属威宁州，时补乌撒卫获守军民，遂晋（进）乌撒卜宅营于城北门外下坝狮子、马金、火龙等山。^{[28]116}

因此，乌撒地域的回族人群仍旧铭记其先祖的穆斯林身份，以及因军事行动而移民来此的历史记忆。又如威宁县《瓦氏谱志》记曰：

溯我瓦氏，派衍天方，先世隶籍土耳其，相传唐初我始祖与戈斯教主通入中华，于陇东平凉府华亭县传教讲学，遂结庐而居焉……大明洪武元年，我族世祖欽公及科、玉公奉太祖朱元璋诏命，以都指挥随征南统帅沐英将军，至黔平定夜郎诸蛮，奉旨不准回籍。^{[28]126}

坚守伊斯兰信仰则是维系他们族群身份的主要方式。这也是同样跟随征战麓川的穆斯林军队没有形成如同汉民“麓川神”信仰的重要原因。明代时，乌撒地域便修建如下坝清真寺、马坡清真寺等多所清真寺。^{[28]93}清初期卫所制度已被废除，但仍有不少穆斯林继续在乌撒地域担任武官，由于他们的助力，伊斯兰信仰在乌撒地域得到持续扩张。据道光《大定府志》记载“韩忠，凉州人。康熙四十三年三月任”威宁镇总兵。^{[14]1431}韩忠同时为下坝清真寺掌教，他与多位马氏武将在该寺刻立《吾教程碑》，倡导穆斯林民众学习伊斯兰文化。^⑭

伊斯兰学者是推动乌撒地域穆斯林民众强化身份文化认同的另一类主力。顺治时期，有名为刘吉的阿訇自陕西游历滇黔，落籍于威宁下坝，并且塑造了本地的回族社群类型，使之从开放型社会转型为内趋型，强化了地方穆斯林民众的族群认同感。^[29]

三、多元民族的交融

乌撒地域的汉民与穆斯林卫所移民，以及世居于本地的彝、苗等众多族群的历史记忆、信仰习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为族群的排他性和归属性等“多元”特征。不过，随着各民族在乌撒区域社会内交往交流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亦逐渐出现了交融为“一体”的趋势，尤其表现于联姻和祖源叙事的趋同性两方面。

（一）婚姻互动

人类学家强调，婚姻作为一种制度不仅仅是个人选择，更隐喻不同的家庭、族群、社会之间的互动。早期历史中，乌撒地域以彝、苗等族群为主要居住者，一般情况下他们之间具有严格的族群边界，尤其表现在婚姻圈的限定性。明以来汉民与穆

斯林卫所移民来到乌撒地域屯守，丰富了地方族群的多元性。而随着移民群体的“在地化”和地方社会的发展，各族群渐次突破固有婚姻圈的限制，开启跨族群联姻实践之路。

1. 汉民与穆斯林移民

明代时候，汉民与穆斯林卫所移民就有通婚的情况。上引明代乌撒卫右所正千户卯实考的墓志铭又载：

公娶本卫蔡明威将军之女，生男四人，长曙也。……娶本卫李怀远将军之女。^[15]

卯实考所娶之妻为乌撒卫蔡氏将领之后。万历《贵州通志》载“蔡礼，和州人。永乐间自贵州前卫指挥僉事改乌撒卫。”^{[18]310}和州为今安徽和县，蔡氏也是今威宁县等乌撒地域的汉族大姓。所谓明威将军，是卫指挥僉事这个职务所授予的散阶称号。穆斯林卯氏与汉民蔡氏生四子，长子卯曙又娶了乌撒卫李氏将领之女，李氏为江苏沛县人，李贵在洪武三十五年（1392年）升指挥僉事，调乌撒卫，其子李雄在宣德九年升任指挥同知，故授予怀远将军。^{[18]303}

明至清初顺治年间刘吉阿訇来到乌撒地域发展伊斯兰信仰之前，穆斯林民众与汉民通婚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也因此考量，刘吉把当地穆斯林大姓马氏分为十多个支系，与张、王等其他三十多个穆斯林族氏商议区别祖先，以推动乌撒地域的穆斯林民众进行内部婚娶。^[30]不过，此后穆斯林民众仍旧保持与汉民通婚的惯例。如，施氏也为明代来乌撒卫屯守的卫所移民，清末时施氏后裔曾迎娶陈氏回民。陈氏生于1861年，逝于1935年，葬于威宁县施氏园陵中，其墓志铭曰“施母陈太君乃威宁县郊区大凹塘村陈老贤公之女也，回族。”^[16]

2. 汉民与彝民

卫所移民中的将领之后也与世居彝民通婚，如上文提到的乌撒卫指挥僉事李贵的后裔。李贵八世孙有名为连涛（洮）者。据说，清初期时李连涛得罪当地富人，逃难到“撒格”（位于今威宁县雪山镇建明村，“撒格”为彝语，意为三镇交接的地方），成为彝族贵族的帮工，娶了程姓彝女为妻，子孙后裔就随祖母为彝族。^[17]

地方传说中，汉民还和彝族土司通婚。成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的《邓氏族谱》中的《分房序》记载：

乘彝祖与文征公由豫章于嘉靖年间，贸易黔南，遂于宁（草）海乌撒卫家焉。落业威宁盐仓邓家营，乘彝公返回原籍未知果否。文征公深通地理风水，自

八卦山转小尖山龙脉至仙人吊脚，贵地一穴，乃属长奶夫人之用地也。文征公抱以虔诚之心，不辞辛苦访到芒部土司府，千里有缘与陇氏土司府长奶千金小姐结为伉俪。生下八子一女，故称为九祖太婆也。乌撒土司依芒部土司府要求，由乌撒土司府画九匹梁（梁）子九条河之地方为陪嫁也。^[18]

邓氏后裔认为：明嘉靖年间，他们的两位先祖从江西豫章到贵州贸易，安家于乌撒地域，具体地点为今威宁县盐仓镇邓家营村。其中一位先祖邓秉彝可能返回了原籍；另一位先祖邓文征精通风水学说，他看上了一块土地，但该地为陇氏土司女儿的领土。于是，邓文征到芒部土司府访问，又与陇氏土司之女结为伉俪，生下八子一女。而且，乌撒土司还赠送了九座山梁和九条河流给芒部土司，是为陪嫁之礼。笔者认为，考证邓氏先祖与彝族土司女通婚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即便是虚构的，该历史记忆也是通过拟构姻亲关系来表达汉彝民族的交融。

3. 多族群之间

跨族群通婚甚至直接产生了新的族群分类标签。如，今多被识别为白族和彝族的“白儿子”（自称为“七姓民”）族群。清代史料载：

白儿子在威宁州，男服饰如汉人，女从苗俗。多赘汉婿于家，生子后婿归汉别取，不复来。其子女有女无父，故名曰儿子。^[31]

白儿子有两种，为猓猓之孽子，一为汉种猓猓，贵黑贱白，名分不相絮乱。^[32]

地方人群将“白儿子”这一族群标签产生的根源描写为乌撒地域汉、苗、彝的通婚，以及对“白儿子”族群“服饰如汉人，女从苗俗”的文化结构复合性特质的描写，有力印证了当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时至今日，乌撒地域汉、彝、回、苗和其他各民族群体之间仍旧频繁通婚。笔者认为，通过跨民族集团的婚姻互动，各民族之间形成了新的多民族亲属网络，并由此搭建了多路径的血缘、文化沟通网，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更好发展。

（二）共同的祖源地叙述

上文指出，乌撒地域的汉民后裔多形成类似“白马街”“柳树巷”的祖源地记忆，以推动他们形成新的地域认同。但在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这一认同符号被其他民族所挪用。如回族董氏，其族谱曰：

考究董氏始祖世系，自居江南应天府直州林川县白马街高石坎，以为人多载，能传后十代，又迁居湖广省麒麟县胡桥座，穿过柳树巷，是十代之后。^{[28]125}

又如上文提到的与汉、彝、苗关系密切，而今又多成为白族、彝族的“七姓民”人群。以其中之苏氏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墓碑记文为例，其文曰：

溯夫原籍，系南京应天府白马街柳树巷珠市桥四方街大石板为记。^①

笔者认为，乌撒地域多民族群体在祖源地名表述结构中嵌入共同的虚构符号一事，反映了他们共建一套知识体系的主观倾向。这种倾向的前提，则是当地多民族群体之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所推动。此种表现于历史认知之上的交融，其实质体现了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一致性。

结 语

乌撒地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从局部生动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明清设立、废除乌撒土府、乌撒卫两大机构，都是因应不同的历史情形而实施的政治策略，有助于西南边疆民族的治理和发展。元代是军事移民屯守乌撒地域的肇始时间，但移民群体及其社会影响均十分有限。明代以来，受卫所制度引导的大规模中原汉民和西北回民、蒙古人穆斯林跨越千山万水，屯田耕守于西南乌撒地域，与世居的彝、苗等民族共同开发这片热土。在此过程中，各民族既维护着相对的“多元”族群认同边界，又自发通过婚姻交换、文化认同等路径融为“一体”。明清乌撒地域的卫所移民与民族交融既体现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对自身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两个认同层次，又反映出各单一民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因此，深化乌撒地域卫所移民与世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既有助于拓宽黔西北屯堡移民的历史研究，也符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

注 释：

①相关著作较多，例如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胡其瑞，中国西南苗族基督徒与国家（1900—1960）[M]，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2022；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张慧真，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刘砾，毕节回族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②详见道光《大定府志》卷五十《旧事志》。《明太祖实录》中提及尚未归顺明廷前的实卜，亦称其为“元右

丞”，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庚辰’条”。

③《云贵马家屯马氏族史资料》下卷，2021年印刷，第333页。威宁县马GX先生藏，笔者采集于2024年2月1日。

④访谈对象：赵B，男，汉族，生于1981年5月，教师；访谈地点：威宁县城；访谈时间：2024年2月23日。

⑤《陈氏族谱》，2006年印刷，第194页。威宁县陈DL先生藏，笔者采集于2024年2月29日。

⑥《廖氏族谱》，清代手抄本，无页码。威宁县廖GL先生藏，笔者采集于2024年2月28日。

⑦《周氏族谱》，2022年印刷本，第8页。威宁县周YS先生藏，笔者采集于2024年2月23日。

⑧碑位于威宁县城凤山寺（上帝庙）内，笔者采集于2024年1月25日。

⑨《响塘坡墓序》，碑立于威宁县城赵氏大宗祠内，笔者采集于2024年2月29日。

⑩《周氏族谱》，2022年印刷本，第10页。

⑪访谈对象：周YS，男，汉族，生于1985年7月，威宁县D乡政府工作人员；访谈地点：威宁县城；访谈时间：2024年2月23日。

⑫碑现藏于威宁县文管所。有研究已考论过该碑，参见：卯丹，试论明代乌撒卫归附的蒙古人与色目人——从《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千户所正千户卯公墓志》谈起[A]，李建军，屯堡文化研究2014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17。

⑬转引于卯丹，从西北蒙古穆斯林到西南汉人——乌蒙高地卯氏家族历史与文化的个案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15—119。

⑭碑位于威宁县下坝清真寺，笔者采集于2024年2月6日。

⑮碑藏于威宁县文管所，笔者采集于2024年2月6日。

⑯施氏园陵位于威宁县六桥街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笔者采集于2024年2月29日。

⑰《世界李氏族谱》，2018年印刷，第130页。云南省图书馆藏，笔者采集于2023年12月31日。

⑱《邓氏宗谱》，2021年印刷，第31页。威宁县邓GQ先生藏，笔者采集于2024年2月27日。

⑲碑立于威宁县小海镇响水村苏氏墓地，碑文由王XF先生提供给笔者。

参考文献：

[1]威宁简介[EB/OL]. [2024-03-13]. <https://www.gzweining.gov.cn/zjwn/wnj/>.

[2]赫章简介[EB/OL]. [2024-03-13]. <https://www.gzhezhang.gov.cn/gyhz/mlhz/ljhz/hzjj/>.

[3]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明朝档案

总汇(59)[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88.

[5]李平凡,颜勇.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M].下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515—516.

[6]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7]土官底簿[M].四库全书本:150—151.

[8]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1—102.

[9]刘大谟.嘉靖《四川总志》[Z].明万历刻本:1059.

[10]沈庠修,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Z].赵平略,等,点校.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11]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文物志[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12]刘秀兰.论明末川黔少数民族土司奢、安之乱[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S5):13—17.

[13]鄂尔泰,等.乾隆《贵州通志》[Z].清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215.

[14]黄宅中,邹汉勋.道光《大定府志》[Z].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15]杜文铎,等.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15.

[16]王丹.近代的黔西北土目阶层与区域社会:以原“乌撒”土目为中心[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4(2):31—39.

[17]谢东山,张道.嘉靖《贵州通志》[Z].下册.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498.

[18]许一德,等.万历《贵州通志》[M].上册.赵平略,吴

家宽,点校.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19]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5572.

[20]苗勃然,王祖奕.民国《威宁县志》[Z].1964年油印本.

[21]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12—120.

[22]赵毅.论“麓川之役”[J].史学集刊,1993(3):56—62.

[23]晋江,何乔远.名山藏[Z].明崇禎刻本:1563.

[24]张廷玉,等.明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897.

[25]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Z].明万历刻本:526—527.

[26]李平凡,马昌达.贵州彝族传统文化调查研究[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2.

[27]陈循.寰宇通志[Z].明景泰内府刻本:3046.

[28]刘砾.毕节回族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29]卯丹.诱以正教,引以中道:乌蒙高地阿訇刘吉的生命史与回族社群文化转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96—106.

[30]余宏模.黔西北民族调查研究文集[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31.

[31]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竹枝词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147.

[32]李德龙.黔南苗蛮图说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91.

The Weisuo Immigrated and Ethnic Blended in Wusa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DAN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Yunnan,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Han peopl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Hui people from the northwest, and Muslim immigrants from Mongolia have settled in the Wusa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Han people manifest their ethnic identity through ancestral narratives, cultural symbols, and belief in gods, etc., while the Hui people and Mongolian Muslims also maintain their ethnic boundaries through texts such as genealogy, inscriptions and Islamic beliefs. However, “diverse” peoples also exchange marriage and use common cultural symbols to move toward “oneness”. The Weisuo migration and ethnic blending in Wusa reg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t only reflect the two levels of identity of Chinese ethnic entities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reflect the internal logic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single ethnic group in China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sa region; Weisuo immigration; nationality; blend

(责任编辑:郑朝彬)